

考古武汉城市圈

余炳贤 著



考古武汉城市圈

编 著 余炳贤

承 印 黄石市图书出版印刷发行服务部

电话:0714-6220545

开 本 850×1168mm 1/32

印 张 5.5

准印证 [2008]鄂石市图内字第 030 号

引 子

2002年,拙著《青铜文化探源研究文集》出版后,受到本土文化爱好者的欢迎。随着黄石矿冶文化城市名片的定位,武汉城市圈的诞生,“圈文化”成为热门话题。在这种大气候下,笔者将近6年所撰本土文化论文结集,名曰《考古武汉城市圈》,综观所收29篇文论,以论文为主体,兼收少量文史资料,作为向2008年北京奥运会献礼,作为拥护武汉城市圈的见证。所收文章学术性较强,实话实说,颇具专业性、知识性、史学性、内容在8+1城市圈内外,包括考古、地理、历史、人物、荆楚、矿冶诸方面研究的最新成果和信息,涉及诸多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尽量展示圈内文物考古资料。材料翔实可靠,一般有出处。《考古武汉城市圈》、《黄石矿冶文化探源》、《黄石市建置沿革志》是笔者近几年所撰写的“三大集成”,正在全部配套出版。目的是为海内外,圈内外从事相关研究的专家、学者提供一些武汉城市圈、特别是黄石、大冶本土资料,以推动繁荣武汉城市圈的学术研究事业。并对1990年版《大冶县志》中的部分谬误予以校正。内容丰富,论点独特,论据充分,尽量注意学术水平和质量。其中《论大冶青铜文化的特色》曾在省级学术刊物刊载,并在省级学术讨论会上交流、宣讲,受到省有关领导和省内专家、学者的肯定。少数文论公开发表过。

2008年,大冶市被国家列为湖北省唯一的资源枯竭城市,青铜文化不能停留在文化单纯层面上,而应转向新的主体经济的精神支柱,一元化和多元化文化并举,凝结城市精神,推动经济转型,这符合科学发展观。文化及其产生的人文精神是永恒的。她是一座城市的灵魂,是城市文明水准的标识。在这“青黄”不接寻找经济支柱拐点之时,出版这本论文集以助探路,从历史的深层发掘动力,为“环境友好”提供依据。寻找8+1武汉城市圈内的社会文化共性,作为精神动力。

研究得知,武汉城市圈8+1城市位置恰好在百越北疆的杨越人区域,三苗、越文化是本土文化根基。春秋后,楚人东扩、楚文化浸润,8+1城市的主体、社会核心文化成为越楚文化,这与圈西的荆楚、巴楚文化还是有区别的。同时,越人创造了以博大精深的青铜文化为主体的矿冶文化,楚人将它推向辉煌顶峰。越楚文化与8+1城市人文的内在联系与武汉城市圈划定十分巧合。

本书有许多观点是很新的,而是很不成熟的,有待于读者将它提高订正。

《考古武汉城市圈》篇目

引子 (1)

一、文化论述

论大冶青铜文化的特色 (1)

论黄石区域文化的根基——越楚文化 (6)

论武汉城市圈的文化渊源 (11)

石开工艺是青铜文化的新载体 (22)

二、黄石地理

大冶“青山场”探实 (25)

初探黄石古城“沂城” (29)

黄石地属南楚 (33)

古鄂地望考 (36)

铜绿山及其周边古铜矿之族属 (42)

再析刘禹锡《西塞山怀古》中的西塞 (47)

三、荆楚史话

荆楚前期史话 (52)

楚灭国及扩境 (56)

楚国选都的地理条件 (61)

楚国冶铜业概述·····	(63)
楚国冶铁业概述·····	(69)
楚人酒文化之诡秘·····	(71)
再析楚熊渠“伐庸·扬越至于鄂”·····	(73)
简论大冶鄂王城的年代及其价值·····	(76)
鄂君启行商路线辨析·····	(84)
简议伍子胥历史功过·····	(88)

四、人物行踪

周昭王淹死汉水左桑辨析·····	(94)
简析张志和《渔父词》中的西塞山·····	(103)
黄巢后期的行军路线·····	(109)
岳飞后裔今何在·····	(110)

五、史海钩沉

先秦时期湖北诸侯国、部落、氏族分布·····	(114)
“九头鸟”与“湖北佬”·····	(120)
大冶栖隐寺历史简介·····	(122)
《山海经》是夏代九鼎通神物象书·····	(129)
从远古历史传说探索中国国家起源·····	(150)

后记·····	(167)
---------	-------

论大冶青铜文化的特色

大冶的人文底蕴是青铜文化，但在过去 20 余年的宣传中，却强调一个“早”字，把“早”作为大冶青铜文化的特色，如“大冶是世界青铜文化的摇篮”，“大冶是青铜文化发祥地”，“世界青铜文化之火从这里点燃”。可迟到如今，收效甚微。世界青铜专家、中国矿冶学者、历史教授，没有一个人正式发表文章、演说称道大冶青铜文化最早，他们赞叹的不是“早”。早在 1982 年 2 月，国务院就将铜绿山古铜矿遗址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将她列为我国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预备名单。遗憾的是，近年从“申遗”预备清单中删除了，代之以江西瑞昌铜岭。这一“除”一“代”的原因固然有多种，而与过去的一些提法不当不是没有关系，“早”之名不正，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果如此说，则无异只承认历史影响，而否定历史的创造作用。任何联想只是在证据的支持下才能成立。目前大冶尚无“摇篮”、“发祥地”的充分证据。青铜文化的内涵与特质，大冶青铜文化的准确定位，必须实事求是。

突出一个“早”字实际是想证实一个“老”字，老与古通。古老的直接证据是大冶铜绿山古铜矿遗址，这是最早、最老的典型实物。它有晚商周初、春秋战国两大矿场，其文物测定上限至今 3300 年左右，即殷商晚期的小乙时期。纵观中国青铜史，中国青铜时代早在夏代就已经在中原地区开始了，至少有 4000 年，中国青铜文化的发祥地在黄河流域，在中原地区，有 4000 年以上历史，比大冶铜绿山早 1000 年以上。本来青铜文化的发祥地是没有一个具体地点的，后世文物考古发掘的遗址只是其中一个代表。

世界最早铜制品出土于西亚、伊拉克北部靠近土耳其的一处

遗址,公元前 5000 多年,伊朗南部、土耳其和西亚的美索不达米亚北部一些地区,在叙利亚东部和伊拉克境内,其先民使用铜器开始增多,开始使用铜的时代。世界上最早进入“青铜时代”是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大冶铜绿山古铜矿的采矿迟于西亚 2000 年。迟于中国黄河流域 1000 年。江淮流域的东夷(越)和长江流域的戍人(华夏族团越人)是中国青铜的发明者,最早使用者。越人南迁将采冶技术带来古大冶。

大约距今 6000 至 4000 年左右的时间里,在黄河流域广大地区,都先后不同的进入金石并用的过渡时期,先进的地方已叩响青铜时代的青铜门环,其工艺粗糙,器形单调,缺少花纹,处于初始阶段。但比大冶铜绿山古铜矿的矿石粗炼饼块早 1000 年。

青铜文化的发祥同世界青铜文化的始原一样,是多源的,只见于某一地区,而不确认于某一地点。世界青铜文化以中原地区为代表有四、五千年,大冶青铜文化以铜绿山为代表 3300 年。早,不是大冶青铜文化的特色。倘若将大冶视作中国青铜文化发祥地,那就无异于缩短了中国青铜文化史 1000 多年,违背了中国矿冶发展史、人类史、兵器史等相关学科历史。况且,大冶没有本土制作的青铜器,也不见铸造青铜器作坊,只有粗炼炉和外运的粗铜饼。更无同期古城文明。青铜是铜、锡或铅合金,大冶有铅无锡,整个黄石地区无锡矿,青铜器中的锡青铜多于铅青铜。锡、铅在青铜器物中配比约 2:1。大冶境内找不出一座作坊,铸制青铜器作坊设在国都或诸侯国邑。作为青铜文化发祥地,不仅需要铜矿或者作坊,还要有强大的政权代表全国。这就要有国都或大都市作证明。一个地方政权所属的矿山和作坊只能称誉一地。大冶铜绿山古铜矿国属(族属)先扬越后楚国,未属周王室。顶峰在春秋战国时期。大冶是青铜原料的主要产地、供给地,红铜不等于青铜,不等于青铜器,但红铜是构成青铜的主要材料,占 90%以上。没有红铜便没有青铜,更没有因青铜器的制造使用产生的青铜文化。文化是不断发展的,有人就有文化,文化跟人走,青铜文化的发展依赖于具有较高文化素质的人。铜绿山古铜矿是较高文化素质的人的智慧结晶,她丰富、发

展了中国青铜文化,也代表了中国青铜采冶文化的始原根基。

大冶青铜文化的特色不在一个最“早”,也不在一个最“大”,而是最“优”和最“富”。

以大冶铜绿山为代表的大冶铜矿区和以大冶为源头的长江江南铜矿带,兴旺时期正处于中国青铜文化发展的第二个(也就是青铜时代最高)顶峰,她是中国青铜文化顶峰的矿场物证。我国青铜冶炼,在殷商时代达到第一个高峰。专家们分析证实,不仅当时湖北各地需要的铜主要来自大冶,而且当时中原地区所需的铜,也是主要来自大冶为中心的长江流域。这才是大冶铜的历史价值。

大冶铜绿山古铜矿,范围约 2 平方公里,遗址清理出西周至汉代千余年间不同结构不同支护方法的竖井、盲井,平巷 400 多条(个)和一批古代炼铜炉,随同出土的还有大量用于采掘装载、提升、排水、照明、选矿、碎矿的铜铤、竹、木、石制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特别是 16.3 公斤的大铜斧,凝聚着古代劳动人民的勤劳与智慧,成为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瑰宝。遗址地面堆积的古代炼渣在 40 万吨以上,据推算,当时产铜约 10 万吨。专家推算,与铜绿山同期的大冶境内古代炼渣是铜绿山炼渣的 10 倍,炼渣含铜大多低于 0.7%,粗铜纯度达到 94%。三千多年前的古代炼铜炉,具备了现代冶炼高炉的基本特征和原理,国内外专家学者一致公认,大冶铜绿山古铜矿遗址,其年代之久远、规模之宏大、技术之精湛,在中国首屈一指,在世界亦属罕见,是我国年代最早、规模最大和保存最完好的古矿冶遗址,其历史地位极高,完全可以同周家店遗址、殷墟遗址、秦始皇兵马俑媲美。其古矿井,都是顺因富矿床的走向,采取竖井、斜井、平巷和盲井相结合的有效开采方式挖掘而成的,深度可达 50 米左右。矿井的人头支架,同时使用“榫接方框”法和“搭接方框”法构成,牢固而稳定,有些竟然至今仍完好地支撑着。从井下提升矿石是原始的“分层人力提升法”,在上面安装了辘轳,以长绳、竹钩、竹筐、藤篓作为运载工具,提高效率,减少体力,在没有任何机械动力条件下,能够进行如此深广的开采,这真是世界古代采矿史上的奇迹。已发现 10 余座炼铜竖炉,外观圆台形,由炉基、炉

缸和炉身三部分组成。采用氧化铜矿石还原熔炼工艺,鼓风给以足够风压和风量,就能冶炼所有铜矿石,代表我国最高的冶炼水平,采冶兼顾,充分利用人力,科学地解决了采矿、提升、排水、照明、井巷支护,井下开拓及运输、通风等,自成体系,是现代地下采矿系统工程雏型的雏形,这在当时世界上是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铜绿山在春秋早期即出现先进的鼓风炼铜竖炉,是我国几千年来烧制陶器的技术基础上,经过长时间的摸索和实践逐步发展起来的,为炼铁高炉及生铁冶铸技术在春秋时期的发现及后来的迅速发展提供了技术前提。是中华民族骄傲!我国与世界上文化发达较早地区(如两河流域、古埃及等)相比,古代在金属使用方面的起步并不算早,铜的使用大约要晚 1000 多年,到春秋时期,无论在冶炼技术和生产规模方面都已在世界上处于遥遥领先地位。冶铁业同样如此。

大冶铜绿山古铜矿工艺、技术水平,堪称世界一流。无论从矿区范围、井巷结构、矿渣遗存、鼓风竖炉、辅助工具等等都令人惊叹!还是从西周、春秋、战国、西汉四个历史时期,前后延续 1000 多年,延续开采时间最长,采、选、冶、运兼备,结构复杂,保存完好,世界独一无二。该遗址在世界同类遗址中,它所达到的高度发达的技术水平,处于世界之最,并已在国际采矿、冶金、考古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铜绿山古铜矿发现之前,认为中国铜料来自国外,铜绿山古铜矿有力地回答了中国青铜铜料外来论,它证实了中国青铜文化是一部独立的完整的历史。铜绿山古铜矿开采的年代距我国青铜器的使用已有千年历史,但它的开采利用的绝大部分时间是处在我国青铜时代的鼎盛时期,供给王室、贵族,诸侯制造青铜器物的红铜时间长、数量大,现在青铜器物不少是大冶铜绿山及其周围大冶矿区所产的铜制成的,精彩绝伦的中国大量青铜器皿闪烁着古大冶之光。湖北省考古界普遍认为,黄石大冶地区很可能是这个文化区域的中心地带,其文化发展水平明显地高于其他地区,有着自身的个性特征和文化传统。黄石地区本土中极为宝贵的传统文化,就是矿冶文化,而矿冶文化的核心、源头就是青铜文化、铜文化,其核心代表是铜绿山。全世界五大洲 30 多个国家的专家学者

及其他方面的客人，对大冶铜绿山古铜矿的赞誉都在一个青铜文化的“优”字，国际友人普遍认为：“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古迹！是一个令人神往、令人难以置信的遗址！”一位澳大利亚学者说：“我们在世界其他地方，从未见过保护得如此完好的古铜矿遗址。”德国金属公司洛塞维博士说：“见到这么一个近 3000 年的古矿遗址，我们感到非常震惊！特别是这个古矿的采矿方法与当今的采矿法如此类同，我们十分高兴。”麦丁教授说：“在世界其他地方，看了很多古代矿冶遗物，铜绿山是第一流的，在中东等地虽然很早就开始了铜矿的冶炼，但保存这样规模的地下采掘遗址，较完好的冶炼用炉，炉渣温度高，流动性好，含铜量低是很少见的。”学者专家们称誉的是一个“优”字，优就是好。至今，没有一人称“早”的。

大冶是从采铜和冶铜发展起来的，采矿冶炼是大冶城市文化的积淀，青铜文化是大冶城市文化的根基，成为大冶魅力的底色。规模开采从商代起，炉火延烧至今 3000 多年，近代张之洞在大冶创办了亚洲最早、最大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高炉遗址被定为“国保”文物，全国第一家国家级矿山公园已经开园，拥有“全国工业旅游示范点”等多项桂冠。大冶铁矿是毛泽东主席生产视察过的唯一一座铁矿山，矿冶峡谷拥有世界第一高陡边坡，亚洲第一露天采坑等多项桂冠。

大冶青铜文化特色之二是“富”。富包括多。大冶市矿藏资源丰富，素有“江南聚宝盆”之称。境内已发现和探明的矿产有 65 种之多，大小矿床 273 处，列入储量表的矿产 42 种，铁矿石储量 3.5 亿吨，是全国 10 大铁矿生产县(市)之一；铜矿石 550 万吨，名列全国 6 大铜矿石生产基地之一；黄金 122 吨，白银 750 吨，储量居全省之冠；硅灰石居世界第二。铜绿山铜矿纯铜储量为 105 万吨，品位 1.79%，在我国名列前茅，在湖北独具首位。铜绿山是大型金矿、大型钴矿、中型银矿、中型铁矿，还有钼、硫、磷等 10 多种矿藏，是座富山。大冶主要有黄铜矿、斑铜矿、孔雀石等，其品位都相当高，孔雀石几乎可以直接当红铜用，矿石平均含铜为 12%。大冶富矿多，品位高，有色及贵重金属矿产的储量占湖北省的 90%。

大冶青铜文化的准确定位是“优”和“富”，是矿冶历史文化名城，中国青铜源料基地，世界“青铜科技之都”。“青铜文化中心”，浓缩为“青铜名都”。大冶城市精神是：勤奋创业、富民强市、开拓求新、广采博纳、和谐诚信。

青铜文化、矿冶文化是大冶的传统文化、本土文化，彰显城市个性，文化建设孕育现代精神，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我们今后的研究方向应在“优”、“富”字上多做文章，一来符合历史实际，有实物佐证，有专家学者评定；二来与世界矿冶史、中国青铜史保持一致，乃属青铜文化范畴，没有争议。实事求是，恰如其份。

以大冶为中心的江南古铜矿带是古代铜料的主要生产地，铜绿山古铜矿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技术，是我国古代文化发展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里程碑，使人感到人类祖先的伟大。据有关书记载，大冶县地秦汉以来，三国、晋、宋、梁、陈及唐、宋、元、明、清等历史阶段，矿冶一直未停。一部源远流长的中国矿冶发展史，中国青铜文化史，大冶、黄石当之无愧地占有重要一章。

大冶铜绿山古铜矿遗址的保护，就是要留住历史的标本，留住文化的基因，展示文物的精神，并传承这种精神。

论黄石区域文化的根基——越楚文化

文化跟人走，有人才有文化，有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文化。远古、先秦时黄石区域居住的先民开创了属于自己的文化，这就是黄石区域的原始文化。

长江中游见于古籍最早先民是“三苗”。三苗主要散布在湖北湖南，被尧、舜、禹强制北迁，三苗故地空虚，炊烟寥寂。

四五千年前，越人部落集团生活在黄河中游一带，主要在河

南,他们使用一种石斧,叫钺,甲骨文作“戔”,用石戔开垦耕地,逾越山林,过着刀耕火种的烧畚迁徙的农业生活,三五年后换地方,再往前走,故“戔”旁加“走”成“越”。因自然,战争诸因素,越人一部融入炎黄、东夷集团,加盟华夏族;一部南迁或东移,形成大小不一,互不相属的“百越”氏族、部落。越人将夏文化带进黄石。华夏文化的两个支柱是龙凤,交相辉映,今日之黄石区域崇信龙凤呈祥。

北方以黄帝为始祖,以龙为象征;楚文化以炎帝为始祖,凤为图腾;龙凤为黄石区域文化的灵魂,组成“越楚文化”。

越人分布长江中游一带,填充三苗地域,形成夏越部落。由于越人的主要生产方式是“烧畚”,“打几枪换一个地方”,不断地迁徙,氏族分散,部族小,统称为“百越”。

湖北江陵以东,应山以南是杨越之地,黄石区域在杨越大区内。鄂东南之西,有杨越、越章、鄂族。杨越是北方南下的杨人与越人结合的新群体;越章是越人与章人结合的新群体,属杨越大系。鄂东南之东,有干越、赣人、干吴。主要在江西境内,与黄石区域有地缘关系。干越、赣人,干吴因长江、鄱阳湖,幕阜山脉与湖北阻隔,故文化渗透不大。鄂东南之南,有越嬴、邛人、角雉。嬴人与越结合、通婚,成为越嬴。黄石区域除杨越人外,越嬴人也是一个宠大族团,散布于通城、蒲圻、崇阳、通山、临湘、岳阳及鄂州南部,和大冶西南部,今殷祖、刘仁八是其分布区。越嬴人崇信灵龟,今黄石人也崇信灵龟。阳新县为角雉人,大约与嬴人一样,划为上嬴、下嬴,角雉人有可能分为两部分,汉代在阳新东南部枫林镇下羊雉潭设下雉县。邛人创造邛笼,与越嬴人一样,其墓葬地以大石板为典型,他们是石工巧匠,今大冶茗山、陈贵、铜山口多石,邛人散布在这一带,已在陈贵下李城与茗山门前村出土两具大型石棺,各重达7吨左右,形制粗糙。东夷嬴人崇拜灵龟,还以杜鹃为图腾,果城里土主节纪念的实质是嬴人祖先杜(土)宇(主)。鄂东南之北,有山越、西阳蛮。山越是山区的越人后裔,百越中的干越、杨越、于越、越章等居住山区的氏族部落联合成山越部族,三国时孙权征讨过山越,黄盖“用江东六郡山越之人,以当中国百万之众”。西阳蛮居黄梅、广济、蕲

春、浠水一带。西阳蛮、梅夷活动该区域，与黄石隔江相望，梅夷蛮风吹过长江，其辐射为沿江一带，未曾深入。

黄石区域远古先民三苗，由盛而衰；百越和夏人南迁，与土著结合成新的“百越”族团，取代三苗成为黄石主人。群落不同，语言、习惯、性格、体型各异，大杂居小聚居，过着无君长、刀耕火种、缓慢迁徙，兼以渔猎，采集的封闭生活，从来没有统一过，没有建立过国家，由人多势众的大族作主。黄石区域至今不见文献和文物有关“国”的记载。到秦始皇时始见“鄂县”，东汉末年，诺大的一个鄂县[除阳新(下雒)、江夏(沙羨)外所有鄂东南地区]仅万人。可见鄂县是一个小县。地域范围却很大，人口少，到处是茫荒之地。隔江相对的大片地域以黄冈(西120里与麻城交界)为中心建郛县。

越人创造的越文化，黄石区域多有出土：黄石李家湾、大冶金牛、毛铺水库、青龙阁、罗桥街办金铁山、雷公垸、走马山，金湖茅陈垸、牌坊、摇篮山、铜绿山古铜矿、上罗、太子山驾山垸、还地桥、铁山花木塘、阳新猪婆岭、铺垸、岳家垄、一把瓢、半壁山、港下古铜矿遗址等都不同数量的出土了越人特有的单孔石斧、双孔石斧、大孔石斧、长柄石斧、石锤、石铤、有段石铤、有孔石铲、石凿、双孔石铲、石饼、石镞、石刀共数百件和陶罐、鼎、几何形印纹陶、带耳甑、长方形镂空豆、刻槽鬲足等陶器、骨针、陶片，鬲足贝壳刮削器、陶网坠等。1972年5月在东方山汪家巷村出土新石器时代遗址，文物有陶鼎脚、陶片、陶纺轮。陶纺轮的发现，证明远在五、六千年前下陆就有了纺织技术的萌芽。1978年在萧家铺老鹤庙村出土石器时代的石锤、石斧、石杵、陶炉等。文献、文物验证了黄石区域是越人活动区，从新石器时代跨入五帝、夏、商、周三代到春秋，才逐渐被楚势力浸润，一直到三国以后的两晋南北朝、隋唐尚有古越遗族。大冶周边圻春毛家嘴，鄂州周杨桥、华容和尚山、周汤桥常墩，蒲团吴太湾、燕矶窑窑七窑山等发现新石器商、周、春秋时期文化遗址都具越文化特征。九江磨盘墩出土的陶器中有越人刻槽鬲足，有段石铤，武穴长江段挖沙也挖出古越人典型器物。

世界文化起源于河流，中国文化起源长江、黄河，黄石文化是

长江文化一个支系。阳新起源于富水,大冶起源于金湖,均通长江。古越人吸收三苗土著蛮夷文化,开创了黄石区域文化的根基。发展成传统文化,传统就是性格、精神、灵魂,由创立者的性格决定。

文化是永恒的,也是发展的,随着楚族、楚国的扩张,楚人争霸中原的间隙中,乘机东扩。楚熊渠几乎在周厉王征伐、扑灭西鄂全族的同时,依靠琴氏发明的弩机射箭“新式武器”,取代累世所用的桃弧棘矢,近交远攻,兴兵伐庸、杨越至于鄂。他所伐鄂是东鄂,今武汉、鄂州、黄石沿江地带。醉翁之意不在酒,他是为大冶铜而来的。熊渠封其次子红为鄂王。不到一年,熊渠见周厉王扑伐西鄂(河南南阳北,成周之南)太残暴,几乎老幼一个不留,惧怕楚族遭此“大丧”厄运,立即取消王号,自降为“敖”(立前无卓越战功者称敖),熊红鄂王降为翼侯。楚人采取的是近交远攻,鄂邑成为飞地,熊红的采邑。随着王位的自动取消,主动向周称臣纳贡,也就顾不上远在千里之遥的“鄂”地了。但他成功地开辟了东取红铜原料的铜路,可以购买和货物交换所得。楚未在鄂地建县,人口太少,只称“鄂”,一直到战国鄂君启时称邑。

春秋时,楚成王“初收荆蛮而有之”,这是周惠王自顾不暇而特许的:“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于是楚地千里”。楚成王先收汉东至江淮边,由鄂东北过江至鄂东南“收”鄂地,黄石区域正式纳入楚势力,楚主张“因俗而治,不求一律”,文化不搞大刀割切,只能潜移默化渗透,越文化与楚文化并存。从楚成王元年(前 671 年)起,到楚国被秦灭(前 223 年),楚控制鄂邑 450 年,楚文化无疑对黄石区域影响至大。

荆楚文化的底蕴十分丰厚,归纳起来可称为“六大支柱”、“五种精神”。六大支柱是:青铜冶炼、丝织与刺绣、髹漆工艺、乐舞艺术、老庄哲学、屈骚文学。六大支柱里包含了社会经济与科学技术、农业、手工业、商业、城市、天文、历法;楚国的宗教、哲学、文字与文学艺术、绘画与雕刻、音乐与舞蹈。楚人从北往南,与当地居民相结合,既不断吸收先进的华夏文化,又采撷众长,广泛地吸取了各地土著居民文化的积极因素,从而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

的楚文化。尚鬼、崇巫、淫祀、粗犷、浪漫、诡譎、忠君、爱国、务实、包容、和谐。它博大精深、艳丽诡譎，楚文化对黄石影响深远，后期主导过黄石文化，黄石古越文化遗风犹存。两者二元耦合，相得益彰，龙文化与凤文化相互补充，成为黄石区域独有的越楚文化体系。张正明、刘玉堂两专家认为：“楚越两种文化除了在整体上互相融合外，在局部还保留自身某些特点，这也是土著文化顽强生命力的体现。”

按照文化地理学的理论，一个文化地域的确立，须依凭一个独特的“乡土文化区”，它是一种文化的感觉，且深深扎根在人们的意念中。黄石地区社会文化是越楚文化，青铜文化是越楚文化的核心，矿冶文化是青铜文化的延续。

黄石区域出土的楚文物没有古越文物多，据不完全统计有：金质楚币陈（郢）爰、三棱铜矛、铜箭簇、铜戈、铜剑、铁刀、铁斧、铁鼎、细柄豆和钵，绳纹板瓦、筒瓦、卷云纹半瓦，陶鬲、陶豆、陶瓮、陶缸、陶铜坠，青铜剑、铜壶、龙凤铜镜、玉璧等。这其中不一定能证实是楚人所留。

尤其是楚人的五种精神，熏陶了古今黄石人。成为古今黄石人的价值取向。这五种精神是：筚路蓝缕的艰苦创业，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追新逐奇的锐意进取，不断开拓的创新精神；兼收并蓄的融会南北、海纳百川的开放精神；崇武爱国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谐诚信的追求和谐、重承诺的守信精神。楚人的五种精神充实了黄石人，武装了世世代代的黄石人，虽然黄石农村、山区湖滨还有些蛮风越习，而荆俗楚风后来居上，战国后占据了主导地位。

黄石区域文化是黄石地区的精神内核，在这种文化氛围内，提升黄石人的人文素质，增强热爱家乡的自豪感和自信；提升人们的道德情操，陶冶精神，丰富文化生活，有利于建设和谐小康社会。单纯地归之于楚文化缺其底色；单纯地追溯越文化，因年代久远，蛮风多绪且零散，内涵不够深广丰富。两者结合，多元互动，系统、完整、准确地表现出黄石区域文化之根。至于吴文化或者吴楚文化那是东汉末年孙吴带来的，所谓吴头楚尾。吴文化即吴地、吴人的传

承文化,吴地,一般说来是以太湖流域为核心,包含西至南京,北至扬州、淮阴一线以南地区,东含上海,南括浙西地区。若以吴语来说,则南可至浙江温州、永嘉,东至上海,北含南通至扬州以东沿江100里宽的狭长带,西至镇江丹阳的交界处。吴文化是一种具有鱼米水乡特色的地方文化。它包含五个本质属性:水文化、鱼文化、稻文化、蚕桑文化、船文化。这种个性与大中华文化共性的统一,形成了“秀慧、细腻、柔和、智巧、素雅”的社会文化特征。与黄石区域文化有明显的差异。黄石区域楚人统治较长,已自认是楚民了,战国和三国的楚吴战争,对孙吴文化有抵触情绪,孙吴尽管在鄂州市(时称武昌)立都,那只是战略意义的,时间也不长,吴音在黄石飘过即散,今天也看不出有多少痕迹。

三国时武汉地位狂升,带动了长江中游的城市活力。所以黄石西塞山仅见东汉以后墓葬,之前没有发现。

感知黄石区域文化的根基——越楚文化及其物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丰富多彩与精神动力,以唤起我们维护共同的文化财富的豪情与热情,从而自觉地为自己的文化根基培土。

论武汉城市圈的文化渊源

武汉城市圈成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简称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后,圈内话题日益热门。其中,武汉城市圈的文化共性值得一探。

文化,广义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合。文化共性就是这种财富的体现,是具有地方性特征的文化共同体。包括人文精神、社会风貌、民俗习惯等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是一种历史现象,具有民族